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与蒋经国》一书，是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著的《毁灭的种子》一书翻译而成的。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和调查局档案所藏的大量国民党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对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不无参考价值，现将其中的一章摘录如下：

“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堕落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时间，1948年1月，讲演者，蒋介石。从1947年到1950年，当同共产党决逐争夺大陆的斗争进入生死关头时，蒋介石经常以这样严厉的语言训斥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讲话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

在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从不同的方面反复地研究了这个

蒋介石的自辩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在

问题。关于军事方面，蒋介石看到，主要的弱点是缺乏有学识的军官，普通士兵的贫困和自上而下的萎靡不振。

蒋介石承认，对多数官吏来说根本谈不上专业技能，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大部分军官是在“打糊涂仗”。大家都

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

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慎密研究，切实准备。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段不留情面的设问，充分说明蒋介石非常讨厌他的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高級将领，他说，“你们今天作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比起军队来讲，蒋介石对他政权内的那帮行政官僚更是失去了希望。1947年7月，蒋介石哀伤地叹道，在他参加革命的40年中，从来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我们的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有趣的是，蒋介石直言不讳地

流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赞赏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

在1947年至1948年，蒋介石已经对国民党和他的军队丧失信心，但他并不想放弃和毛泽东的角逐。在1949年4月下旬，蒋介石重返政治舞台后，立刻醒悟到，在他匆忙归乡退隐之际，国民党的“痼疾”是这个政敌恶化、崩溃的最终因素。7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提议改造国民党。

在这段改造的日子里，蒋介石经常对他的主要官员讲述这些年来失败的原因。他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班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从1949年底到1950年，蒋介石更注意到要全面地从政权和社会的组织机制中，寻找导致垮台的重要弊病和缺陷。蒋介石断言，组织上的主要毛病，就是在所有的军队内，政工人员制度不健全。蒋介石说道，因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队就没有监督和检查，结果就没有办法核实有关战报的准确性，于

共产党手下?

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组织上的松散,让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四处出没,“也就别指望他们不会无孔不入。”他们专门潜入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机关,探取情报,散布谣言。因此,蒋介石说,大陆的垮台与其说是被敌人的军事所击败,不如说是自己内部的混乱、畏惧和猜忌造成的,而这些又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一手操纵的。

若干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消除那些腐蚀国民革命运动精神的病毒。想把那些缺乏革命精神和品质的人,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但是,这些补救很少成功。

有一次克拉立·陈纳德将军向蒋介石抱怨,说中国的空军军官颓废以及指挥官无能,蒋无奈地说:“能够与我同事的也就这些人了,如果我把他们都罢免,那谁留下来干事呢?”

不过,蒋介石所以不能挽回其失败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他难以理解问题的实质。由于他掌握的那套政治体制根本与外界的批评和压力天各一方,所以他对官僚的舞弊堕落就熟视无睹。他不明白士兵不愿打仗,农民抵制纳税和拒不当兵,是因为他未曾落实那些能够唤起他们去打仗、来相助的政策。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用政治组织可以唤起民众的意志,使他们和政府协调一致;可以触动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为民众带来福利。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在同共产党的斗争中,得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摘自《党风廉政文摘》)



范军在10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撰文说,近闻,某地有个乡镇的领导在会上喊,只要钱不要放进自己的腰包,为企业送掉点钱没问题。作一番观察,诸如这种放任“公贿”的情况十分普遍。

钱不进自己腰包,为企业送钱,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是发展企业的灵丹妙药,权宜之计。但是,众多的教训已经表明,这样做并不是企业的根本出路,如果我们的上级部门放任企业这么干,只能使企业的经营方向从提高内在素质转向走歪门邪道。这样做的结果也只是让企业的命运系于几个贪心者,使企业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摔打。只有千方百

计使企业强大,才有企业的明天。

当然,作为“公贿”也是一种严重的行贿犯罪活动。这种行贿,虽然行贿者的目的是为企业,自己没有直接捞钱,可是它的结果是将集体的钱送给了个人,腐蚀了干部。还有一些地方领导所谓的“保护”,所造成社会危害更甚。

站在国家的高度,站在法制的高度,站在经济规律的高度,站在企业长远利益的高度,“公贿”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愿我们的执法部门立即行动起来,依法从事,治一治“公贿”之风。

(摘自《报刊文摘》)

中国古代的簿记本写数目字也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从甲骨文时代就开始了。大约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查处贪官污吏,查出来就剥皮楦草。他发现贪官污吏们常爱在账本上做手脚:汉字数目字写来颇为简便,添上一笔改成别的数字尤为容易,简直是天生为贪官污吏们侵吞财产准备的。另外,民间契约中的纠纷往往也因此产生。于是朱元璋让有关部门找出十个与之读音相同或相近但笔划较为繁复,不易篡改的字来代替原来的数字,并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加以公布,在簿记和契约中采用,于是一直流传到今。

(杨凡)

大写数字与反贪污的历史渊源